

试论蒋介石对美、日等国 “两个中国”政策的抵制

孙立祥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蒋介石在偏安台湾的四分之一世纪里, 持续抵制了美、日等国的“两个中国”政策, 不仅拒绝美国政府“外岛”撤军和日本政府“台湾独立”之建议, 而且拒不接受其“双重代表权”方案, 是为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图谋终未得逞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 蒋介石对美、日等国“两个中国”政策的抵制是以“反攻大陆”为前提的, 其主要目的系出于维护所谓“法统地位”的需要, 加之多次拒绝大陆和谈建议而错失和平统一良机, 对其评价又不宜过高。尽管如此, 在岛内外敌对势力加紧勾结的新形势下, 追述蒋介石对美、日等国“两个中国”政策的抵制, 对两岸和平统一尤其对应对台海复杂局势, 当有裨益。

关键词: 蒋介石 “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 两岸关系

中图分类号: K27; D829.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1) 12-0096-05

蒋介石在败退台湾的四分之一世纪里, 不仅严惩岛内外“台独”分裂势力,^① 而且持续抵制了美、日等国的“两个中国”政策, 是为“台独”势力在此期间未能坐大和国际上“两个中国”阴谋终未得逞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岛内外敌对势力加紧勾结的新形势下, 追述蒋介石对美、日等国“两个中国”政策的抵制, 对两岸和平统一尤其对应对台海复杂局势, 应有裨益。

一、拒绝美国政府“外岛”撤军建议, 反对“划峡而治”

1953年4月6日,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向媒体透露: 美国政府“正在寻找一个可以保证台湾独立的办法”^②。1955年1月19日,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亦声称“两个中国”是美国“不断加以研究的若干可能性之一”^③。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的这番讲话表明, 美国政府正在积极策动“台湾独立”和阴谋制造“两个中国”。为达此目的, 美国首先在1950年代利用两次“台海危机”, 压迫台湾当局“外岛”停火和撤军, 以接受其“划峡而治”即“两个中国”的安排, 然而均遭蒋介石抵制和拒绝。

1954年9月初, 中国大陆炮击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以表明主权立场, 所谓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同年10月, 在杜勒斯的暗中鼓动和策划下, 一个反映美国政府意志但以新西兰政府名义提出的“外岛”停火撤军方案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 是为《新西兰提案》。看穿美国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蒋介石, 一面指示“驻美大使”顾维钧密切关注“新西兰在安理会的行动”, 因为其提案“将鼓励和支持那些正在以‘两个中国’为目标的人”; 一面训令“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反对联大讨论

基金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07-017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DJ002)。

作者简介: 孙立祥,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博士, 研究方向: 中日关系史。

① 这方面的情况, 参见孙立祥《蒋介石的反“台独”立场述论》, 《史学集刊》2011年第2期。

② 李长久、施鲁佳《中美关系二百年》,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4年, 第183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下,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年, 第2148页。

《新西兰提案》，因为该提案在为制造“两个中国”铺设道路。^①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利用各种场合表明不接受美国的“两个中国”安排。他在翌年2月8日的“国父纪念日”演讲中明确指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别有用心，“两个中国”论“荒谬绝伦”。^②3月23日，蒋介石在接见美国报人塞尔兹伯格时表示“若因我们退出大陈，便以为我们将撤退马祖、金门，那是一个错误，我们一定将为这二外岛而战。”^③4月22日，蒋介石在会见赴台游说的美国总统特使罗伯逊和雷福德时重申了上述立场，表示不管有没有美国协防，他都要固守金、马，并称这是对美方的最后正式答复，以致两位特使扫兴而归。由于中国政府强烈谴责和抗议，加之蒋介石当局进行了一定的抵制，联合国安理会决定无限期搁置该提案。这样，美国政府利用第一次“台海危机”，即借《新西兰提案》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宣告破产。

1958年8月，鉴于美、日等国“分离台湾”即制造“两个中国”阴谋越发凸显，中国大陆对金门再次实施炮击以表明守土立场，所谓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美国为达到军事上避免卷入与中国的战争和政治上“划峡而治”搞“两个中国”这一双重目的，又企图乘机诱迫蒋介石“外岛”停火和从金、马撤军，9月30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如果在那个地区有了看起来相当可靠的停火，我认为，在这些岛屿上保持这批为数不少的部队就是愚蠢的。”^④杜勒斯甚至表示美国没有也不想承担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义务，并宣布拟于10月21日亲赴台湾与蒋介石磋商此事。针对杜勒斯的上述讲话，蒋介石于翌日针锋相对地给予了驳斥，明确表示：杜勒斯9月30日的谈话“只是单方面的声明，因此我的政府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⑤。同样看穿美国逼蒋撤军阴谋的毛泽东，决定配合蒋介石顶住来自美国的压力，共同挫败其“两个中国”图谋。中央政府决定从10月6日起停止炮击3周，使金门军民充分补充军事给养和生活必需品，以利于他们固守；继之又果断在杜勒斯访台的前一天即10月20日恢复炮击，再为蒋介石拒绝“外岛”停火和金、马撤军建议提供理由。有关“台海危机”期间两岸共同抵制美国“两个中国”阴谋以及国共两党围绕金门、马祖默契配合一事，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馆藏的两份解密档案有明确记载。一份是1964年4月13日日本外务省欧亚局局长法眼晋作与英国驻日公使齐格的磋商记录。法眼局长对齐格说“国府的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反对‘两个中国’的国是……国共双方对作为彼此接触点的金门、马祖两岛的态度，十分引人注目。两岛对国府来说，是向大陆证明主权的唯一存在；同时对中共而言，两岛则具有拉住国府的手以防止‘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既成化的意义。从这一点来看，对一致反对‘两个中国’的中共、国府双方而言，两岛的意义也是一致的。”^⑥法眼局长不仅注意到了“国共双方对作为彼此接触点的金门、马祖两岛”的“一致”态度，而且洞悉到两岛“对一致反对‘两个中国’的中共、国府双方而言”所具有的“一致”意义。另一份档案是1972年9月27日中日复交第三次首脑会谈记录。周恩来总理对田中首相说“蒋介石的问题都好解决……杜勒斯的政策是分割大陆和台湾，想把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可是蒋介石不听美国的话。蒋介石是个性很强的人。美国让他把军队撤出金门、马祖……对此蒋介石很气愤。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就增加了对金门、马祖的炮击。于是，蒋介石便有了保卫金门、马祖的借口。”^⑦周恩来说“蒋介石是个性很强的人”，可以视为对蒋介石抵制美国“两个中国”

① 林泓 《蒋介石抵制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② 林泓 《蒋介石抵制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③ 张其昀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883页。

④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2816页。

⑤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2824页。

⑥ 中国課「第2次日英定期協議用資料（昭和39年4月13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秘密指定解除文書』、A1.3.1.1-4-2-1/180045。

⑦ 中国課「田中總理・周恩来總理会谈記錄（1972年9月25日—28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秘密指定解除文書』、1/01-42-1。

政策的间接肯定，也足见国共双方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惊人“一致”的立场^①。正因如此，美国才不得不在随后签署的美台“联合公报”中承认“金门连同马祖的防务是同台湾和澎湖的防务密切相关的”^②；也不得不在日后发表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中表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③这样，美国政府利用第二次“台海危机”制造“两个中国”之图谋亦宣告破产。

二、拒绝日本政府“台湾独立”建议，反对“切割”台湾

从新中国成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多数内阁推行了“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只是表现或露骨或隐晦而已。^④例如，据池田内阁拟制的外交文件《中国问题》披露，1961年时任外务大臣的小坂善太郎在出访美国时，曾带去一份《有关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建议“由美国施压”，“把台湾从大陆切割出来”，“以实现‘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之目标”。^⑤寥寥数语，将池田内阁借美国之力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渴望”和盘托出。针对日本政府的这一政治图谋，不仅中国大陆方面进行了强烈谴责，指出：池田勇人的做法与岸信介的行径如出一辙，“心心相印”^⑥；而且蒋介石当局也给予了抨击和揭露，指出：日本政府“正在策划采取两个中国政策解决中国问题”^⑦。

时至20世纪70年代初，佐藤政府尤其是日本右翼政客又企图乘中日复交之机鼓动台湾当局宣布“独立”，以实现其梦寐以求的“两个中国”政策目标，结果同样遭到拒绝。1971年7月15日即遭受美国“越顶外交”冲击当日，佐藤荣作在日记中表示：尼克松访华本来“值得庆贺”，“但接下来对台湾问题的处理将越发困难”^⑧。1972年9月19日即田中首相访问北京前夕，奉命“安抚”台湾当局的椎名悦三郎特使亦向蒋经国表示：现在日本与台湾之间没有“矛盾”不现实。那么，佐藤首相所说的“困难”与椎名特使所说的“矛盾”到底所指为何？原来，两人意在表明：由于国共两党均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立场，迫使暗中推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的日本当局不得不顾此失彼，致使日本政府处理起中日“两国三方”关系颇感“矛盾”和“困难”。其实，时任日本政府外务次官的法眼晋作在《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两个小时（即9月29日上午9时），已将这层意思明白无误地传达给了台湾当局驻日“大使”彭孟緝。他说：既然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立场，那么日台“外交关系”便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而难以维持，“诚属遗憾”。^⑨在此，法眼不仅把日台“断交”的责任推给了台湾当局，认为蒋介石是“自食其果”，而且流露出出现今天这一结果并非日本政府所愿，因此深表“遗憾”。不难看出，在20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三方”关系发生剧变的历史转折关头，蒋介石虽然千方百计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化，但还是坚决抵制了日本政府及其右翼政客乘机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之行径。

① 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的“一个中国”当然是指所谓“中华民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国共两党主张的“一个中国”内涵不同，台湾当局也没有资格窃据联合国代表席位，但两岸都坚持了一个最根本的立场，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已经归还中国，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阴谋。这无疑有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使国内外敌对势力分裂中国的政治图谋终未得逞。

② 林泓《蒋介石抵制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③ 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光明日报》1972年2月28日。

④ 吉田茂内阁铺设了“两个中国”对华政策轨道；鸠山一郎内阁和岸信介内阁制定了“两个中国”对华政策；池田勇人内阁暗中“完善”了该项政策；佐藤荣作内阁将这一政策推向巅峰。

⑤ アジア局「中国問題（昭和39年12月14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秘密指定解除文書』、4/02-175-6。

⑥ 观察家《评岸信介到台湾的肮脏使命》，《人民日报》1961年8月17日，第4版。

⑦ 「外交文書公開 “2つの中国論” に傾く，中台反発で “敗北” 』『日本経済新聞』2000年5月29日。

⑧ 田村重信等『日華断交と日中国交正常化』東京：南窗社、2000、113頁。

⑨ 林金莖『梅と桜-戦後の日華関係』東京：サンケイ出版、1984、303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对有日本背景或与日本关系密切者始终保持了一定的警惕，一般不委以赴日重任，这从蒋介石批签文档中的一些记载看得非常清楚。例如，1951年5月，当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秘书长张其昀建议选派“甚得日人好感”的魏华鹄赴日工作时，蒋介石作出了“魏不宜，可另选派”^①的批示；1965年10月，当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谷凤翔建议派遣“亲日派”张群赴日参加“国父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时，蒋介石又作出了“暂缓再定”^②实为拒绝的批示。实际上，从蒋介石治台期间很少任命有日本背景者出任驻日“外交官”，也能洞察他对暗中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日本政府的警惕。

三、拒绝美、日等国“双重代表权”方案，反对“两个中国”安排

美、日等国利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制造“两个中国”之动议，由来已久。早在朝鲜战争结束不久，美国政府就开始鼓噪修改联合国宪章，研究联大接纳“两个中国”的可能性。1954年10月，杜勒斯国务卿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议“我们对中国和台湾采取的政策，应当同我们正在德国和朝鲜奉行的政策属于同一类型。”^③言外之意可以像对待德国和朝鲜那样，将本来属于内战遗留问题的台海问题国际化，将“两岸分裂”永久化。对此，蒋介石提醒美国不要也不可能强迫他接受任何“条约”以外的义务。^④进入20世纪60年代，针对美、日、英等国继续利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制造“两个中国”的行径，蒋介石持续进行了揭露和抵制，这在2000年5月解密的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有明确记载。其中，比较典型的档案资料有两份：

一是前面提到过的1964年4月13日日本外务省欧亚局局长法眼晋作与英国驻日公使齐格的磋商记录。法眼局长说“自由各国虽然都主张应给予中共联合国代表权，但包括贵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不支持台湾归属中共。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中共参加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中共和国府双方都主张‘一个中国’，这是很难办的……不但中共不妥协，而且国府方面至少蒋介石也固执地坚持‘一个中国’立场。”^⑤这份档案表明，日、英两国本想利用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之机制制造“两个中国”，但由于“中共和国府双方都主张‘一个中国’”，“不但中共不妥协，而且……蒋介石也固执地坚持‘一个中国’立场”，以致令它们感到“很难办”，难以达到分裂中国之目的。

二是1966年10月7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拟制的一份外交文书。这份文书宣称“对联合国‘两个中国’决议案的提出，我国有必要慎重对待。对我国来说，佐藤政府的‘两个中国’之意愿和这种解决方法本来是我国所希望的，但若投票表决的话，有必要考虑弃权。因为国府和中共唯一的共同点是都对此表示反对，如果公开赞成将招致不愉快。所以为了给未来的政策留有余地，弃权比较稳妥。”^⑥这份档案显示，佐藤政府本有制造“‘两个中国’之意愿”，也希望用两岸并存于联合国“这种解决方法”来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但因“国府和中共”“都对此表示反对”，同时“为了给未来的政策留有余地”，日本才考虑表决时“弃权”，反映出由于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立场而迫使佐藤政府不得不慎重对待该问题之事实。至于为日后留下回旋余地和以暧昧、模糊方式表述政府立场，则是日本外交的一贯伎俩和传统。

上述档案表明，日、美、英等国在20世纪60年代利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制造“两个中国”

① 邵铭煌、薛化元《蒋中正总裁批签档案目录》，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中国国民党党史馆，2005年，第510页。

② 邵铭煌、薛化元《蒋中正总裁批签档案目录》，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中国国民党党史馆，2005年，第40页。

③ 资中筠、何迪《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页。

④ 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卷2，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453页。

⑤ 中国课「第2次日英定期協議用資料（昭和39年4月13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秘密指定解除文書』、A1.3.1.1-4-2-1/180045。

⑥ 中国课「日本の対中国政策（昭和41年10月7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秘密指定解除文書』、6/02-1127-2。

或“一中一台”之阴谋所以破产，主要系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所致，但也与蒋介石当局的抵制不无关联。

时至1971年上半年，美、日等国还在向联合国大会抛出“双重代表权”提案，试图一面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一面保留蒋介石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从而酿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局面。甚至在第26届联大即将投票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前夕，日本驻联合国代表还在鼓动蒋介石当局声明“独立”。^①然而，这一旨在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提案，立即遭到国共两党的一致反对和共同抵制。中国大陆方面指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主张；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状况，中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②台湾方面也表示：任何“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安排，“中华民国”都不予以承认。^③在10月25日联大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时，由于国共双方一如既往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即如果允许台湾当局继续窃据联合国席位，那么中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如果恢复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那么台湾当局就“拒绝留在”联合国而宣布“退出”（实被逐出），结果美、日等国乘机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再度宣告破产。关于台湾当局“退出”联合国的动因和效果，事后蒋氏父子均有所表白。蒋介石认为，此举打破了国际上的“两个中国”幻想，并粉碎了“这种阴谋”^④；而蒋经国亦表示：台湾方面所以坚决退出联合国，“是因为我们不愿意也不承认有所谓‘两个中国’存在”^⑤。尽管蒋氏父子的上述讲话有些冠冕堂皇，^⑥但仍可视为其持续抵制美、日等国“两个中国”政策过程的一环。

总之，蒋介石在偏安台湾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一方面基于“民族主义的精神”^⑦持续抵制了美、日等国的“两个中国”政策，有助于配合大陆粉碎国际间的“两个中国”阴谋，应当给予恰当评价；另一方面也须看到，蒋介石对美、日等国“两个中国”政策的抵制是以“反攻大陆”为前提的，其主要目的系出于偏安台湾一隅需要，加之多次拒绝大陆和谈倡议而错失和平统一良机，又是负有相当历史责任的，因此对其评价不宜过高。但这并不影响对其正面作用和现实意义的评估。

责任编辑：刘 莉

① 司马桑敦《中日关系二十五年》，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第324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人民日报》1971年8月21日。

③ 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卷3，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013页。

④ 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卷3，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011页。

⑤ 万生更《试论蒋氏父子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个中国”立场——兼驳吕秀莲的“远亲近邻”谬论》，《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⑥ 有如前述，中国政府早已严正声明，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前提是必须将台湾当局的“代表”逐出联合国。既然联合国已经决定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那么台湾当局的“代表”从中“退出”便是题中应有之义，是不以蒋氏父子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⑦ 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卷1，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66页。